

文化冷戰在香港： 《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 1950-1970（上）

• 傅葆石

摘要：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香港逐漸成為亞洲文化冷戰的重要戰場。伴隨着「第三勢力」南下，來自中國大陸的流亡知識份子在香港成立了友聯出版社，接受美國的秘密資助，出版《中國學生周報》，並將其打造為華人世界最受歡迎的青年刊物。《周報》的出版發行，結合了文學創作、文化啟蒙、外聯活動，以及意識形態鬥爭。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幕後推動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密切合作，在擁護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同時，致力於傳播文化民族主義理念，為流亡者搭建跨越代際的溝通橋樑，以此爭取海外華人的「民心」。但在中美關係走向和解的1960、70年代，《周報》則逐漸迷失方向，與新一代香港青年失去連結。本文立足於檔案資料和口述材料，從微觀史角度重構這份青年雜誌的歷史語境。《周報》背後的歷史，凸顯了香港流亡難民、英國殖民管治，以及中美文化冷戰間相互糾纏的複雜經驗。

關鍵詞：友聯出版社 《中國學生周報》 亞洲基金會 第三勢力 文化冷戰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三節。

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蔽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

——唐君毅^①

這是一片沙磧上生着荊棘的荒場，
你卻要開墾，望它終會變成沃土。……

北面的冷風要吹倒你瘦弱的身軀，
頂上的烈日要曬到你低頭，……

但你咬緊牙，又舉起鋤。

不要惋歎中州的落絮今夕飄零如許，
明天我們帶豐盈的果實歸去。

——齊桓②

〔《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少談令人煩惱的政治社會現實……讓青少年自由飛翔於另一世界中，有似登高俯覽，好不快活。……這是青年人反建制、反主流情緒的表現，亦是六十年代的普遍趨勢。

——羅卡③

全球冷戰中文化的作用與角色近年來備受學界矚目。學界逐漸注意到在美蘇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兩極對抗格局下，隱蔽的文化宣傳以及與此息息相關的情報收集和學術交流的重要性，毫不亞於軍事行動和高層外交。這一特點尤其體現在英屬殖民地香港的文化政治衝突中。二十世紀中期，香港以「觀察中國的前哨」而聞名。正如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以下簡稱「中情局」)局長科爾比(William Colby)憶述：「在收集情報等方面，最具挑戰性的莫如柏林、維也納和香港三個城市。」④近年，得益於檔案的普遍解密，有關歐美國家隱秘鬥爭的學術研究方興未艾。相較而言，我們對香港、中國大陸乃至其他東亞國家在文化冷戰方面的探討，仍受制於有限的研究材料。譬如，對全球華人文化認同有重大影響的邵氏與國泰(電懋)兩大亞洲電影機構的商業檔案尚未公開，同樣沒解密的還有台灣國民黨藉以介入香港娛樂業的「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檔案。

因此，目前有關全球冷戰文化的認識是不平衡的。以歐美研究為例，桑德斯(Frances Saunders)和萊許(Alfred Reisch)關注美國中情局在歐洲進行的「文化宣傳秘密計劃」；肖(Tony Shaw)和克萊因(Christina Klein)展示了美蘇政府如何利用大眾媒體和文學作品進行冷戰動員⑤。然而，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一時期的香港？處於世界兩極霸權格局之中，香港既有其特殊性，亦有其典型性。不同於朝鮮、越南、馬來亞等其他亞洲國家地區爆發的不同程度的「熱戰」，香港並未經歷過任何軍事戰役或反殖民運動，但又區別於1948到1949年柏林危機後進入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謂的「冷和平」的歐洲⑥。冷戰高潮時期，中國解放軍南下收復殖民地似乎時刻迫在眉睫，一種強烈的政治不確定性籠罩着香港。與此同時，雖然蕞爾小島香港在超級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中處於邊緣地位，卻如柏林、維也納在歐洲一般，成為了亞洲爭取「民心」的中心戰場。最近幾年，香港(連同朝鮮、台灣)的文化冷戰研究引發了學界的廣泛興趣，研究主要集中在南來作家的文本分析和高等教

育的政治性，包括周愛靈和張楊研究美國秘密參與香港中文大學（包括新亞書院）的籌建過程，沈雙探索有關亞洲基金會資助的華語語系文化網絡，以及王曉珏對於反共文學的細緻討論^⑦。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另闢蹊徑，立足於檔案資料，從微觀史角度重構一份秘密接受美國資助的香港青年雜誌的歷史語境，藉以探討在亞洲文化冷戰的風雲變動下，它在中美意識形態對立、力爭海外華人「民心」的宣傳戰中的角色，以及其所反映出的這一時期香港的複雜多變的文化政治。隨着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一批從中國大陸逃難到香港的反共知識份子成立友聯出版社，逐漸形成了一個小型的出版帝國，刊發多種面向不同年齡群體的讀物，而《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周報》）可謂其中的旗艦出版物。它將意識形態鬥爭與文化信息傳播、文學創作以及外聯活動相結合，鼓吹建立一個根植於原有文化傳統的「民主中國」。《周報》創刊於朝鮮戰爭爆發不久的1952年，不過幾年，從香港迅速拓展，遍及大量海外華人聚居的東南亞地區，直到1974年停刊，是華人世界辦刊時間最長且極具影響力的青年刊物之一。

本文基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亞洲基金會專檔，結合《周報》出版人和編輯的口述史（特別是盧瑋鑾和熊志琴合編的兩冊《香港文化眾聲道》^⑧），聚焦於《周報》出版的最初十年。在這一階段，冷戰的主戰場從歐洲逐漸移到亞洲，《周報》與美國中情局在幕後推動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其前身為自由亞洲委員會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CFA]，1954年更名。為行文便利，全文統稱「亞洲基金會」）密切而隱蔽地合作，致力於爭取海外華人群體的「民心」。在亞洲的文化冷戰中，《周報》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是否如近年的批評指責所言，它只是為美國意識形態侵略服務的「工具」^⑨？從歷史的角度看，《周報》繼承了1920至1930年代上海的自由主義文化人和在野政黨的精神，與「第三勢力」運動有直接而隱微的關聯，它秘密參與中美宣傳戰的過程，訴說了怎樣的被史學大師錢穆稱作「一部香港流亡史」的故事^⑩？在那段艱難的歷史時期，這份雜誌又以何種方式向我們揭示了文化生產的政治化，以及其在香港與東南亞之間的跨界互動問題？事實上，隨着香港成為亞洲文化冷戰的戰場，美國為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地區的影響，進行了鮮為人知的文化介入活動，並與目標各異的地方勢力糾纏互動，《周報》的歷史與政治正闡明了這段隱秘複雜的關係。

一 「第三勢力」南下

長久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外貿易的大門。在港英時代，憑藉發達的轉口港經濟和相當完備的法律制度，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大陸難民逃離戰亂的庇護所。同時，由於殖民地的「政治中立」和相對自由開放，在中國現代史上扮演了關鍵角色。例如，「共和革命之父」孫中山不僅在香港接受了大學教育，還在此設立了反對滿清的興中會總會。回溯歷史，孫中山自1895年從夏威夷檀香山歸國，籌措資金，發動軍事起義，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香港都是中國

革命的重要活動基地。在1940年代，香港更成為了抗戰時期中國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在當時，香港只是逃避戰亂的難民的短暫駐足地，他們大多沒有長久定居的打算，一旦賺足金錢，或待政治風向改變，就會選擇返回大陸。

然而，這一趨勢在1949年發生了轉變。隨着共產黨迅速取得政權，在接下來的幾次政治運動（如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中，數以百萬計的民眾被迫逃離大陸，來港避難。1945年日本戰敗後，香港重新被英國政府接管，其時人口總數在六十萬左右。然而到1951年底，這一數字躍升到230萬。這一時期，少有人選擇返回大陸，加之殖民政府於1950年在深圳河沿岸設立邊境管制，人口流動受到嚴格限制^①。大量難民雲集，使香港成為了一個住房緊張、物資短缺、失業嚴重，充滿苦難和極端不公的二元世界。正如1952年一名美國記者的觀察：「中國的富豪、歐洲人和美國人在香港如魚得水，而中國的窮人卻活得不如牲畜。」^②

這些難民大多是來自鄰近省份的農民、苦力和小生意人，也有來自廣東以外被當地媒體稱為「白華」的群體，他們不講粵語，多為精英出身，堅持反共立場。其中既包括國民黨舊官僚、破落地主、商業巨頭，也有文化領袖、大學教授和學生群體。他們滿懷因共產黨橫掃中原而失卻家園的痛苦，被迫融入陌生的粵語文化環境，對不確定的未來充滿迷茫（也有人希望伺機東山再起）。在這一講國語的難民群體中，很多人成為曇花一現的「第三勢力」運動的中堅力量，這同時意味着美國開始介入戰後香港事務。

「第三勢力」起源於1920年代的上海，在留美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中產生過一定影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青年黨和社會民主黨。它們多採用小型的政黨形式，以「調解人」的角色自居，通過出版雜誌和為報刊撰文的方式，努力在公眾面前呈現自己介於腐化墮落的國民黨和以蘇聯為師的共產黨之間的形象，成為那些呼喚自由、公正和民主的獨立人士的傳聲器。在國民黨政府被擊潰前，「第三勢力」中的部分領導成員「向左轉」，加入共產黨「聯合戰線」政府，而另一些不受台灣方面歡迎的成員則逃往香港。他們與一批國民政府敗將遺老、桂系要員、知名學者等，建立起各種組織，如「民主中國座談會」、「大中國建國會」，試圖在激烈的動亂時局中發揮政治影響^③。

與此同時，1949年8月，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在《中美關係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以下簡稱《白皮書》）上公開解釋，試圖應對來自共和黨的抨擊。共和黨有針對性地指責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的失敗，不但沒有鞏固蔣介石政府的統治，還令中國落入共產主義之手，「失去了中國」。而《白皮書》則認為，實質上，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論美國採取怎樣的援助措施，都無法扭轉歷史的走向。文件中最具爭議性的部分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的〈呈遞總統《白皮書》函〉。他的信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第四十八次會議內部文件（NSC 48）中，主張鼓動中國的內部力量，暗中消除蘇聯的影響。艾奇遜稱，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相互衝突，由共產黨領導中國，恰恰「背離了中國傳統」，他們「宣稱對蘇聯這一外國政權俯首帖耳，而蘇聯在這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一直不懈地致力於拓展他們在遠東的控制勢力」。或許是考慮到1920年代以來

「第三勢力」的發展歷史與遠景，艾奇遜預言，「中國文化傳統的民主個人主義會重佔上風，她終將擺脫國外的枷鎖」。而美國政府要做的，就是「無論當下和未來，對中國的一切發展支持到底」。這一說法反映的正是杜魯門政府的理念，他們相信，中國人民終會奮起，顛覆共產主義政權。如歷史學家范力沛 (Lyman P. Van Slyke) 所指出，《白皮書》在海峽兩岸影響深遠。一方面，它啟發毛澤東發表一系列文章，譴責美國帝國主義的偽善面目，並隨後成為越南戰爭期間意識形態動員的核心；另一方面，國民黨領導則利用這份文件推動政黨改革，並加倍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⑭。

《白皮書》在香港難民群體中也引起了廣泛討論。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蔣介石政權在劫難逃，那麼接下來將由誰領導中國人民擊敗中共、反攻大陸？事實上，為了實現《白皮書》所提出的，「鼓勵中國內部的一切力量」，延續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傳統，推翻共產黨統治，美國政府對香港難民群體中那些既不支持共產黨、也不投靠國民黨的「第三勢力」產生了興趣。1950年1月，巡迴外交官杰塞普 (Philip Jessup) 訪問香港後，美國支持「第三勢力」的計劃全面展開。美國總領事館政治部 (1950至1954年由高立夫 [Ralph N. Clough] 領導) 和新成立的中情局 (香港站負責人為舒爾特海斯 [Fred Schultheis]) 開始逐步致力於秘密資助政治人物，組建具有「第三勢力」傾向的政治組織，並在香港媒體中散播「親美」言論。曾有美國記者在概括這時期華盛頓在香港的策略時說道：鼓動「第三勢力」的運動儼然成為了一個公開的秘密^⑮。流亡哲學家徐復觀在其創辦的《民主評論》上便多次告訴讀者：「『第三勢力』極有可能是由美國朋友發起的。」^⑯ 史學家錢穆在《師友雜憶》中的說明則更加直接：「此後在港，即聞有一第三黨之醞釀，並有美國方面協款支持。」^⑰

在人口稠密、擁擠不堪的香港，失業嚴重，通貨膨脹加劇，很多難民被生存問題所困擾，對美元的需求因而與日俱增。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宣稱自己政治獨立，並向西方情報組織販賣信息 (大部分屬於謠言傳聞，或是從大陸出版物上收集的虛假消息)，以此獲得經濟收入。香港的情報活動因此異常活躍，僅次於當時的柏林^⑱。1950年代前期，由於美國的介入，香港曾湧現出一大批「第三勢力」團體和出版物，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由美國命名的「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它由二十五位知名人士組成，包括廣東抗日名將張發奎、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國燾。指導委員會對外宣稱，其目標是團結一切組織，爭取建立一個「民主中國」。他們接受來自中情局的支持，在位於沖繩和塞班島的特工基地受訓，向大陸空投政治難民，組織和發展反共力量。指導委員會缺乏廣泛的民眾基礎，並因持續不斷的派系鬥爭和政治投機主義幾近癱瘓，於1952年重組為「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以下簡稱「戰盟」)，但仍無以為繼，既不能形成統一的領導，也無力整合意見不同的「第三勢力」團體。這些組織最終四分五裂，各自繼續依賴美國資助存活。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逐漸轉變其政治策略，再次支持當時中國僅有的反共政權——蔣介石政府。以1954年戰盟瓦解為標誌，「第三勢力」運動告一段落。促使這一運動迅速消亡的原因還在於殖民當局的壓制，他們擔心此類運動會惹惱中國政府而給香港帶來政治動盪。例如，指導委員會著名的創建人顧孟餘，因其影響力

引起了香港警察政治部的注意，多次收到將被驅逐出境的警告，不得不逃亡日本¹⁹。

儘管這場政治運動不過幾年便宣告終止，但「第三勢力」的一些文化團體的影響卻並未結束。特別重要的是自由出版社及其旗艦刊物《自由陣綫》，作為這段歷史的產物，它們對後來的《周報》產生了直接的、決定性的影響。《自由陣綫》於1949年底創刊，由一批青年黨成員籌辦，倡導自由民主，發表對國共兩黨的反對意見，其中出力最大的是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曾任農林部政務次長的謝澄平。由於組織管理不力，當杰塞普訪問香港時，雜誌已瀕臨破產。據謝澄平的朋友回憶，由於杰塞普是哥大法學教授，謝澄平試圖利用母校的關係尋求與杰塞普會面。雖然沒有如願見面，他卻有機會與幾位美國總領事館政治部的官員接觸。經過多次交換意見，謝澄平獲得了美國的秘密資助，用以擴展他的文化事業。除了《自由陣綫》，謝澄平經營的自由出版社在當時還發行了三種報紙，出版過一套「自由叢書」（截至1954年12月，該出版社已發行超過二百部作品，主要圍繞着「反奴役、反極權」的主題），以及運營一個專門收集共產主義中國資料的研究所。與此同時，謝澄平還建立了幾個小型的文化組織，倡議民主，其中成員包括了日後友聯出版社和《周報》的創始人。他向報刊作者提供豐厚的稿酬，解決了很多流亡知識份子的溫飽問題²⁰。1951年蔣介石派出兩名代表（其中之一是著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雷震，後來與蔣反目）到「第三勢力」中臥底偵查。他們發現：「謝澄平在文化方面辦有《自由陣綫周刊》……以稿費名義資助生活困難之知名之士及青年學子，每月開支，以目前計，不少於港幣六萬元，其款係由美國主持情報方面取來，而以大陸情報交換之（其所有情報由報紙及各方訪問得來），在香港方面以文化工作反共頗有成績，網羅青年學子亦不少。」²¹

謝澄平經營的自由出版社對香港短暫的「第三勢力」運動做出了兩方面的持久貢獻：第一，儘管自由出版社在戰盟中處於邊緣地位，但它致力繼續1920年代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足跡，挑戰國共兩黨的專制意識形態。正如一位作者呼籲的：「〔我們首先要〕鼓吹正確的思想……抱着戰鬥的人生觀……摧毀專暴的、反動的、黑暗的、賣國的統治，以建立國家獨立、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生活自由的新中國。」²²1950年後，儘管出版社逐漸充斥着帶有冷戰色彩的二元化言論，但它追求「政治民主，經濟公平，文化自由」的口號廣為流傳，仍在流亡知識份子中維持着影響力。第二，謝澄平曾頗富遠見地強調，「第三勢力」運動想要在海外繼續它的發展勢頭，就應當指導和動員年輕一代去追求民主，改變中國²³。他在組織各類出版文化活動的同時，力圖爭取學生和青年知識份子的參與。然而，由於他生性多疑，且未能藉《自由陣綫》發展出一種吸引



《自由陣綫》(資料圖片)

青年的新風格和新話語，使他們融入其中，貢獻力量，從1952年開始，自由出版社聲勢減弱，直至六年後停止營運。

二 冷戰香港

冷戰時期，香港成為逃離共產主義的政治難民的避風港，然而它風雨飄搖，前途未卜。英國的殖民管治還能維持多久？共產黨的勢力會在何時跨越深圳河，接管殖民地？目前，在沒有充分確鑿的書面證據去解釋為何1949年共產黨「解放」廣州後並未繼續南下進軍香港的情況下，人們通常根據英國情報資料或個人回憶錄進行推測：如北京方面擔心收復香港會挑起與西方勢力的全面戰爭，或中共領導層有意離間冷戰頂峰時期的英美同盟。類似地，一個幾乎不言自明的說法是，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都在追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目標。然而，這個政策從何時開始正式實施，它是否成為中共中央的官方政策並下達到地方，仍然是個謎團。

曖昧不明的中共政策，給戰後的香港製造了一種普遍的不可預料之感。時隔多年，一位美國新聞主任在一次訪談中提及：「人們感到中國大陸方面可能隨時入侵香港，每個人都無法確定這座城市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還可以存續多久。有人認為會到1960年底，另一些人則持更加悲觀的態度。」²⁸這種不安感在「白華」群體中體現得更加尖銳。當時，受美國資助的雜誌《亞洲畫報》的創辦人張國興，表達了頗具代表性的看法：「講到香港之前途，使我想起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南京的一天。我向當時的新統治者中國共產黨申請到香港來。那時我是合眾社的特派員……〔不久後〕所有外國通訊社均被查封，所有的工作人員必須離去。於是，我只好向當局申請路條，當我告訴他們目的地是香港時，其中一位長征幹部，定睛瞪着我，驚詫而有敵意的盤問道：『為甚麼去香港？我們還沒有解放那裏。』……那些盲目崇拜，和只有一條鞭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人，幻想解放香港或其他地方，已經自認為是他們的歷史任務。他們這種歷史任務的觀念，長期以來，常對香港的前途，作祟擾攘。」²⁹

中共獲勝前夕，英國組建了大規模的軍事力量，設置海、陸、空立體防衛，保護香港免受大陸的潛在進攻³⁰。整個1950年代，香港殖民政府常常舉行閱兵儀式，給旁觀者一種「現代的」、「強大的」印象，以此警示深圳河對岸的近鄰。但共產黨並未發動軍事襲擊，這同樣讓英國的決策者擔憂，認為中共會在他們的勞工支持者中間激起動亂，用其他方式破壞香港的穩定。為了維護社會秩序，1949至1950年香港警務處啟動了一項聲勢浩大的募員計劃，組建了「亞洲最強有力的」警隊之一³¹。另一項保證穩定的重要政策是實現資本主義繁榮，即發展自由開放、不重干預的市場經濟，加強國際貿易和投資，同時重視法治精神（甚至早在1920年代，就曾根據當時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實行過嚴格的中文出版審查），讓民眾對英國統治下的資本主義未來充滿信心。正是通過上述舉措，香港進入了與比鄰共產主義社會迥異的發展模式。這些嚴格的政治管控和經濟增長政策，奠定了冷戰時期英國殖民管治的基礎。

1947至1957年出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可謂危機時代決定香港統治與政策的關鍵人物之一。作為一位殖民地事務管理的資深官員，葛量洪領會到香港在大英帝國中的獨特性：它是「中國的自古以來的領土」，因而「永遠不會獨立」^⑳。他相信，無論中國由哪一派政黨執政，統治香港首先是一項需與中國政府合作的事情。這一立場使得葛量洪與倫敦方面不時產生衝突，因為英國傾向於從自身利益和全球政治的角度出發，尤其要兼顧當時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但在葛量洪看來，與中國打交道，特別是面對一個由旗幟鮮明的反帝政黨領導的中國，需要一種謹慎周全的「平衡策略」，「避免與中國人產生不必要的衝突」，同時堅決維護英國統治的合法性——他稱之為真正的「當家作主」^㉑。像很多香港殖民歷史中危機時刻的繼任者一樣，葛量洪追求對中國的「中立」政策。在全球冷戰時代，這意味着盡可能地保持香港的開放，讓它平等地接觸各種勢力，但拒絕讓其中的任何力量利用「其弱勢地位」或不顧殖民地法規，興風作浪^㉒。香港學者鄭樹森對此有着形象的比喻，他認為在整個1950年代，香港政府的角色有如一位裁判，將嚴格的遊戲規則應用到所有參賽者身上(觀賽者亦如此)，試圖掌控一項異常艱鉅的比賽^㉓。

如前所述，中共並未武力收復香港，很可能是顧忌西方勢力，避免挑起軍事衝突。也有觀點認為，其目的是努力促使美英關係出現裂痕。隨着冷戰在地區的愈演愈烈，特別是朝鮮戰爭後美國針對中國設置全球性的貿易壁壘，香港的地位只會變得愈來愈重要。它既是世界了解中國的窗口，也成為中國聯通資本主義市場的橋樑。由於香港特殊的戰略地位和自由港優勢，來自全球各地的人摩肩接踵。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香港一度成為亞洲的間諜首都，冷戰又將其秘密活動推向極致。共產黨在香港擁有龐大的情報網絡，從不同渠道收集各類秘密信息以對抗敵人，特別是針對「蔣介石集團」和美國。中共特工長期監控美國總領事館和國民黨特務組織，也滲透進香港警察高層、商界和文化界。例如，據一名負責文化外交的駐港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以下簡稱「美新處」)資深中國員工揭露，他的家人曾被大陸方面挾持作為人質，他因此被迫秘密偵查美國的文化宣傳活動^㉔。中共收集情報的能力之強大，從1955年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可見一斑。當時中國政府代表團租用印度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計劃途徑香港前往印尼參加萬隆會議，搭乘者包括周恩來總理，這一消息被廣為報導。共產黨通過秘密情報，得知國民黨炸毀飛機的計劃，並向香港警方透露消息。但在警察採取行動前，飛機已被炸毀，周恩來則因其臨時改變航線而倖免於難。大陸當局利用這一爆炸性的新聞，譴責英國政府管理不力，使香港淪為秘密反共活動的基地。這一事件引發了殖民當局對國民黨特工的大規模搜捕，對香港警察內部進行清洗重組(諷刺的是，在清洗過程中發現了一名由倫敦警察廳總部訓練的華人高官，實際上是共產黨內奸)^㉕。

借助於1940年代日本侵略時期的基礎建設，共產黨在香港建立了一個可以無限延展的文化網絡——從書店、文學社團到電影製作和報紙發行，中共藉此向世界各地的人們，特別是旅居東南亞的華人群體，講述中國革命的故事，與蔣介石政府和美國爭奪意識形態霸權，香港因此成為了中國的文化冷戰中心。在這段時期，即便美國出台貿易禁令，中國依然可以通過香港獲得

急需的重要戰略物資，如橡膠、石油製品和外幣等。而外國從與香港的貿易（如食品供應）、金融和走私中獲取的巨額外匯，幾乎覆蓋了絕大部分中國與西歐的貿易逆差^④。

香港的風雲變幻同樣影響着美國冷戰戰略的走向。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後，香港成為美國政府的關鍵監聽站——觀察共產主義中國的「瞭望塔」。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無疑是一個「小而精」的機構，儘管組織架構不大，卻「比世界上90%的〔美國領事館和〕大使館更為重要」^⑤。為了滿足美國政府對共產黨在亞洲滲透的消息的渴求，香港成為了當時所謂「觀察中國」的中心。在美國領事館，特別是政治部、中情局以及美新處，匯聚了多位「中國通」。在一位美國官員的描述中，他們的工作「猶如一名鳥類學家徘徊在樹林周邊，這些觀察員在中國的外圍研究中國」^⑥。他們既從公開途徑（如大陸每日的新聞和對難民的訪談）搜集信息，也研究秘密渠道的情報資源，還負責監督相關中國員工，將這些材料譯為英語（1949年前很多中國員工在大使館工作），並以《中國大陸報紙選譯》（*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和《中國大陸雜誌摘錄》（*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的形式寄送至華盛頓、西方的重要新聞媒體和大學圖書館。美國同樣謀求將香港作為對抗中國的秘密活動基地。例如，中情局特工曾試圖潛入地方的共產黨組織，在香港招募難民，將其空投到大陸，讓他們收集情報或發動叛變，並沿南海岸線為國民黨的特種部隊進攻提供軍事協助^⑦。然而，如美國情報官員一向抱怨的那樣，這些活動不斷被香港警務處阻撓，以防挑起與中國的爭端。

美國的宣傳網絡遍布亞洲，香港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1957年的NSC文件〈美國對港政策〉（NSC 5717）揭露：「近年來，駐港的美國新聞處重視生產新聞期刊、書籍、電影劇本、廣播節目，以及另外一些針對（東南亞）華人的反共材料。」^⑧1960年6月召開的NSC會議，在討論到美國是否應當在共產黨煽動的香港內部動亂中派出軍事力量時，中情局局長杜勒斯（Allen Dulles）認為，香港殖民地的「用處」在於，它「大體上成為了中共和遠東情報計劃的關鍵基地。尤為重要的是，它既是一個監聽哨所，又作為反共書籍、期刊、傳單等的出版中心」^⑨。事實上，在抵制共產黨文化宣傳擴張的過程中，美新處和很多被桑德斯挑釁地稱為「中情局委派的冷戰創業資本家」的組織——尤其是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及亞洲基金會（後文將詳細探討），在香港扶持了眾多文化項目，向整個地區的中國人推銷民主觀念和美國價值。美國方面總結道，在各類成果中，出版事業最受認可。其中，文學譯叢（主要是美國文學經典和帶有反共傾向的非虛構作品）以其別具一格的形式，在大學生群體中影響廣泛，特別是在台灣。《今日世界》（*World Today*）的出版同樣值得關注，這一中文刊物印製精美，以宣傳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為主，據說擁有超過十二萬冊非同凡響的銷量。美國為這些刊物的作者提供超出一般標準的稿酬，藉此籠絡諸多文化精英^⑩。同時，設備齊全的美新處圖書館，不僅藏有美國最新出版的圖書雜誌，還定期開設英語課程，放映電影，舉辦有關美國大學申請的講座，這些活動在青年中間很受歡迎^⑪。多樣的文化活動成為冷戰極為有效的文化武器。這其中同

樣包含了美新處直接或間接支援的流亡知識份子主持的各種意識形態色彩隱晦的「灰色宣傳」(grey propaganda)，如泛亞通訊社(Pan-Asia News Agency)和通行一時的袖珍本反共「五毛錢小說」。他們還利用大眾媒體，散布親美觀點，作為從亞洲自身角度產生的客觀材料，宣揚美國價值。又如，1950年代中期，亞洲毒品販賣案的故事廣為流傳，中國政府也牽涉其中，然而香港殖民當局在數月的偵查後發現，這只是美國文化宣傳精心策劃的結果⁴²。正是在「第三勢力」的反抗活動、冷戰的文化政治和英國的殖民管治相互糾纏的複雜語境中，《周報》背後的歷史脈絡得以呈現。

三 亞洲基金會與亞洲「文化戰爭」

1951年10月，亞洲基金會香港主持人艾偉(James Ivy)在寫給舊金山總部的一份備忘錄中，興奮地描述了他會見中國流亡學生組織的幾位核心成員後的看法。艾偉認為，這些青年人與香港的大學學生不同，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學生運動和反共計劃」，「堅信民主自由原則」。這些青年身上異乎尋常的政治追求，給艾偉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提議總部「全力支持」他們的活動。近期解密的材料證實，亞洲基金會以非牟利基金會名義在1951年3月註冊，與針對歐洲文化界的自由歐洲協會(Free Europe Committee)相近，實際上是中情局的外圍組織，專責美新處等一般的美國官方機構不方便公開的各種印刷和廣播宣傳，滲透進「竹幕」(Bamboo Curtain)裏去，以至其他充斥着共產主義勢力的亞洲國家。在艾偉的備忘錄抵達舊金山總部前後，國務院和中情局愈加懷疑非歐洲背景的亞洲基金會運行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的可行性。同時，為了更有效地對抗毛澤東政權的宣傳，需要將工作重點轉移，即憑藉「去集權化」的方式，讓「精心挑選的亞洲成員領導當地組織」，以此動員「海外華人」，得到他們的支持，從而為其「爭取亞洲色彩」⁴³。

自1952年起，亞洲基金會愈來愈強調印刷媒體的重要性，並注重加強與亞洲地方青年組織的合作，如新聞通訊社和廣播電台，帶着特定的目的去接觸這個地區的海外華人青年。1953年8月，前情報官布拉姆(Robert Blum)上任會長後，亞洲基金會徹底終止了它的廣播節目。「亞洲基金會」的命名儘管削弱了意識形態色彩，但實際上它仍在繼續暗中推動中情局在亞洲的隱秘宣傳計劃。與十三個亞洲國家的代表一道，亞洲基金會繼續關注教育和青年工作方面的反共運動。他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新一代青年會在他們各自的國家中施加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影響」⁴⁴。亞洲基金會訂立了一個基本原則：由於亞洲地區普遍懷疑美國會借機干預當地的發展，因此鼓勵本地化，即由當地人士作為領導，組織和開展活動，爭取亞洲(特別是海外華人)支持美國精神。因此，亞洲基金會沒有公開推展自己的計劃，而是如1954年《組織章程修改案》(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所言，「將美國的秘密支持給予亞洲那些正在為贏得和平、獨立、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而奮鬥的個人和組織」⁴⁵。直到1960年代，亞洲基金會一直秉持着這些原則，推進工作重點。

艾偉懷着激動的心情向舊金山總部推薦的流亡學生組織，正是「民主中國青年大聯盟」（以下簡稱「同盟」）。在1951年10月的會議後，同盟成員馬上起草了備忘錄，交給亞洲基金會代表，闡明了同盟的歷史與目標。這份文件的修辭方式受到冷戰期間美國反共的二元化話語特點影響，首先追溯了1944年同盟作為一個學生組織在重慶的起源，它吸納了成千上萬遍布於中國各個城市、各個不同大學校園的成員。同盟秉持着典型的「第三勢力」的目標，即「在國共兩黨之外創造一種新的政治影響，一種追求政治民主、經濟公平和文化自由的理想中國的民主事業」。實際上，這幾乎一字不差地重申了香港自由出版社此前提出的國家使命。1949年共產黨勝利後，同盟首先將其總部遷至台灣，後來轉到香港，致力於「促進海外活動」，以「推翻中國共產主義專政」為目標，「大部分成員活躍在與大陸隔海相望的另一端，從事軍事和文化活動」。儘管這段歷史敘述中的一些細節明顯帶有粉飾事實的意圖，但顯然同盟中的青年知識份子，既對毛澤東的新政權不滿，也對腐敗的國民黨不抱以任何希望，他們在顛沛流離中繼續追求從專制統治下解放中國的目標^⑥。

據胡佛研究所的亞洲基金會專檔資料顯示，除了前國民黨軍事官員史剛毅（Anderson Sze Kong-ngai，又名史誠之）外，同盟的核心成員均出身於中國精英大學，他們或是在校生，或是剛剛畢業，在逃至香港前未曾投身於政治。例如，其中最著名的青年流亡學生徐東濱（William Hsu Tung-pien）和燕歸來（Maria Yen，原名邱然），分別是北京大學西文系和哲學系的學生；燕歸來的著作《紅旗下的大學生活》影響廣泛。此外，余德寬（John Paul Yu Tak-foon）從北京輔仁大學畢業，陳思明（Jefferson Chen See-ming，又名陳維瑋、陳濯生）就讀於中央大學政治系。他們被迫流亡異鄉，置身於陌生的風俗和方言中，失業貧窮，孤獨無依，懷着強烈的鄉愁，似乎已然一無所有。由於祖國已「淪陷」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這些青年知識份子只能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尋安慰，將自我的追求投射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傳統脈絡中，汲取精神力量，成為「民主中國」的不懈志士^⑦。

這群青年所使用的意識形態化的誇張言辭（以及他們的英文名），似乎直接來自美國冷戰反共話語，同時也表明他們普遍親近美國的對華政策。實際上，自二戰日本戰敗後，在中國特別是城市知識份子中間，人們由於覺察到美國政府干涉國共衝突，逐漸拋棄對美國的好感，轉而產生反美情緒，並在1950年代達到高峰。然而，同盟的青年流亡者卻呼籲繼續保持中美間的「傳統友誼」，聯手對抗「共同的」敵人——「蘇聯帝國主義」（及其「附庸」中國共產黨）。他們主張，「只有通過相互信任，緊密合作……才有望克服我們面臨的巨大危機」^⑧。正是在抵抗亞洲「共產主義侵犯」的「文化戰爭」語境中，這一「合作」才變得更為迫切和關鍵。與艾偉一同參加會議的徐東濱在1951年12月13日的一封闡述同盟目標的信中寫道，冷戰是一場「總體的鬥爭」，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場「文化鬥爭」，一場「生存方式的鬥爭」。他指出，儘管「真理掌握在我們這邊」，但「自由世界卻忽視了文化戰爭的重要性」，因此才導致「香港的共產主義文化宣傳泛濫」。他從自己對香港書店的觀察中略帶誇張地引述了幾個例子，藉以說明文化宣傳的重要性。當支持大陸的左派書店都在銷售「簡

易」包裝和「出奇廉價」的出版物時，自由民主人士經營的書店裏卻只有偵探故事、裸體畫冊和實用技術手冊。在這一力量不對等的「文化戰場」上，同盟猶如單槍匹馬，孤軍奮戰，它需要「大量文化戰士」的增援，去贏得這場爭奪人心的戰爭。因此，同盟需要亞洲基金會的幫助與支持^④。

1950年代初期，左翼人士利用1930年代後期組建起來的靈活有序的宣傳系統，掌控了從報紙雜誌到流行電影的大眾媒體，主宰着這一時期香港的「文化戰場」。「在光明與黑暗、自由與奴役間跋涉的時代」，為了擊退共產主義的侵略，1952年5月4日燕歸來致信艾偉，提議他優先考慮動員和支援中國青年流亡知識份子，因為他們擁有「強烈的鬥爭意願」，渴望逃離「鐵幕」，加入「我們共同的事業」，「建造一個民主中國」，然而他們貧窮無助，勢單力薄。為了同盟的未來發展，燕歸來提出兩項建議，繼續向亞洲基金會尋求財政支持：第一項提議是建立一座類似於移動圖書館的機構，便於流亡青年閱讀反共材料；第二項提議是刊發一份「學生周報」，藉此喚起流亡學生「對祖國的責任感」和國際民主鬥爭的意識。她後來又進一步建議，吸納學生志願者，特別是新亞書院的難民學生，讓他們幫助編輯和分銷《周報》。1949年，新亞書院由一批聲名顯赫的流亡知識份子創建，其中包括新儒家哲學家唐君毅和史學大家錢穆^⑤。他們以堅定的反共立場和虔誠的復興中華文化的信念，在戰後香港形成了一股主要的文化力量，一座指引未來的燈塔。很多青年知識份子進入新亞書院，繼續他們在流亡中被中斷的學業。1950年代，由於資金預算的壓力，新亞書院開始接受來自台灣和多個美國基金會的財政支持（如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並在十多年後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建校三大成員書院之一^⑥。同盟與新亞書院同仁聯繫緊密，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分享着相同的痛苦流亡經歷和對毛澤東革命的敵意，同樣也出於他們對師長的仰慕，特別是感動於錢穆的學識、個人魅力以及復興中國文化的使命感（下篇將詳細探討），而且燕歸來的父親邱椿是哥大博士，師從杜威（John Dewey），與胡適同為自由主義先鋒，是青年黨的重要人物，任教於北大教育系時與錢穆相熟。



新亞書院桂林街舊址。（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校史館網）

這群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和政治追求頗為引人矚目。他們毫無保留地信奉美國冷戰意識形態，使得艾偉決定給予他們熱情的支持，並敦促舊金山總部全力支持同盟的「文化戰爭」。艾偉引以為傲地告知舊金山總部，同盟成員確實稱得上香港青年中的佼佼者，對「民主自由原則」有着堅定務實的責任感，而不似他們的同齡人，或對政治避而遠之，漠不關心；或頭腦一熱，缺乏理性

考量。艾偉的信件反映了文化冷戰背景下美國介入香港的重重糾葛和複雜網絡。亞洲基金會的官員強調了高立夫對同盟的「肯定」態度；如前文提及，高立夫是美國總領事館政治事務幹事，在香港「第三勢力」運動的發起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對同盟青年的看法極有可能來自此前從自由出版社獲得的印象，這一點進一步說明了同盟的政治立場。1952年5月27日，在另一封寫給舊金山總部的信件中，艾偉傳達了香港美新處一位官員的意見，他們對同盟的反共工作很有信心。美新處繼而在其廣受讀者歡迎的中文雜誌《今日世界》上發表了一篇同盟成員所作的文章。亞洲基金會也準備將這篇文章發表在他們的刊物上，分發給留美的中國學生⁶⁰。

與之相關的問題是，艾偉與同盟青年是如何相遇的？二者的合作起源於何時，又是如何達成的？根據逃往香港後很快開始參與同盟活動的何振亞的說法，正是何義均安排了這場會面。

何義均是陳思明在中央大學政治系學習時的老師，1940年代末期任廣州美國領事館顧問。然而，據當時很可能參加了這一會面的新亞書院學生奚會璋的回憶，是燕歸來父親的好友桂中樞將這群青年知識份子介紹給艾偉的⁶¹。桂中樞是中國第三黨運動的活躍份子，上海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文化界的巨擘，逃亡香港後任《英文虎報》(*Hong Kong Standard*)總編輯，兼亞洲基金會的特約顧問。上述兩種說法皆有可能，又或是他們都在安排這場會面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



1956年，奚會璋獲美國國務院邀請參加國際青年領袖會議，返港時美國領事館總領事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與友聯出版社諸友到機場迎接。中間二人分別為麥卡錫與奚會璋，左一為王健武。(圖片來源：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59。)

根據艾偉1951年10月的信函，他曾邀請同盟的流亡青年寄給自己一份詳細闡述同盟歷史的備忘錄，並建議雙方在日後的活動中「互相合作」。與此同時，為了表達對這一團體的熱情，艾偉安排他們加入每周面向大陸聽眾的自由亞洲電台的廣播節目，並讓桂中樞買來四千本燕歸來的作品《紅旗下的大學生活》，分發給留美的中國學生。1952年6月2日，艾偉向舊金山總部轉發燕歸來的信件，提議支持同盟，幫助他們建造移動圖書館，出版《中國學生周報》，並為這兩個項目提供各500美元的資助。不僅如此，他建議由擅長管理的留德經濟學家兼新亞書院總務長張丕介給予同盟「總體指導」。由此可見，亞洲基金會幫助促成了兩個流亡知識份子團體的跨越代際合作⁶²。作為一個帶有鮮明「亞洲色彩」的「本地組織」，加上得到美國文化戰官員的推薦，很快舊金山總部便批准了整個計劃。從1952年6月3日起，似乎在一夜之間，亞洲基金會悄然參與了香港的文化冷戰⁶³。在獲得美國方面財政支持的一個月後，友聯出版社開始出版《周報》，並逐步建立起一個跨國出版網絡。(未完待續)

註釋

- ①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載《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2005），頁2。
- ② 齊桓：〈賀學生周報九周年〉，《中國學生周報》，第470期（1961年7月21日），第2版。
- ③ 羅卡：〈登高望遠方〉，載羅卡主編：《60風尚：中國學生周報影評十年》（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2），頁5。
- ④ William Colby and Peter Forbath, *Honorable Men: My Life in the C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8), 103.
- ⑤ Frances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Alfred Reisch, *Hot Books in the Cold War: The CIA-funded Secret Western Book Distribution Progra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Tony Shaw and Denise Youngblood, *Cinematic Cold War: The American and Soviet Strugg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Tony Shaw, *Hollywood's Cold War*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7);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⑥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6), 228.
- ⑦ 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Brill, 2011); Zhang Yang, "Cultural Cold War: The American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e Power of Culture: Encounte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Priscilla Roberts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 2016), 148-69; Shuang Shen,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Quarterly* 69, no. 3 (2017): 589-610; Xiaojue Wang, *Modernity with a Cold War Face: 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 ⑧ 盧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二冊（香港：三聯書店，2014）。
- ⑨ Law Wing 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1.
- ⑩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新民書局，1970），頁12。
- ⑪⑫ 吳灞陵編：《香港年鑒》，第五回，上卷（香港：華僑日報社，1952），頁1-3。
- ⑬⑭⑮ Christopher Rand, *Hongkong: The Island Betwee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2), 66; 120-33; pt.2.
- ⑯ 有關中國「第三勢力」的研究，參見 Carsun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2); Lyman P.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69-259。關於這些成員在香港的早期活動，參見劉紹唐編：《卜少夫這個人》（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72-79、250-53；徐復觀：〈第三勢力問題的剖析〉、〈變態心理下的第三勢力問題〉、〈如何解決反共陣營中的政治危機〉，載黎漢基、李明輝編：《徐復觀雜文補編》，第六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28-47、60-67、68-82；林博文：〈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2014年4月28日），地方文革史交流網，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9591；焦大耶：〈第三百六十一行買賣〉，《新聞天地》，第294期（1953年10月3日），頁6-9。

¹⁴ Lyman P. Van Slyke,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a White Paper 1949, with Original Letter of Transmittal to President Truman from Secretary Dean Acheson*,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stream/VanSlykeLymanTheChinaWhitePaper1949/Van+Slyke%2C+Lyman+-+The+China+White+Paper+1949_djvu.txt. 關於國家安全委員會NSC 48文件與杜魯門關於「中國內部因素」的觀點，參見Kevin Peraino, *A Force so Swift: 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New York: Crown, 2017), 102-26, 246-52; Hong Zhang, *America Perceiv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53*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2)。

¹⁶ 參見徐復觀：〈變態心理下的第三勢力問題〉，頁60-67。此文最初發表於1950年11月香港的著名雜誌《民主評論》。

¹⁷ 引自余英時：〈中國自由知識人——《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五〉，《明報月刊》，第53卷(2018年5月)，頁19。

¹⁸ James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78-85; Christopher Rand, *Hongkong*, 118-22。高立夫稱這些難民為「信息販子」，並認為其中的「虛假信息」總是「很難被發現」。參見Charles S. Kennedy, "Ralph N. Clough" (1990), The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Information Series (以下簡稱ADST), www.adst.org/OH%20TOCs/Clough,%20Ralph%20N.toc.pdf, 32。

¹⁹ 相關背景可參見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7), 191-220; 陳正茂：〈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的主要團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始末(1952-1955)〉，《北台灣學報》，第34期(2011年6月)，頁441-59;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8月號，頁47-63; James Lilley, *China Hands*, chap. 6; Christopher Rand, *Hongkong*, 121-28。

²⁰ 參見郭士：〈「自由出版社」滄桑史〉，《醒獅月刊》，第1卷第1期(1963年1月)，頁8。

²¹ 轉引自陳正茂：〈第三勢力運動與《自由陣綫》的初試啼聲——謝澄平〉，載《逝去的虹影——現代人物述評》(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211-12。

²² 〈我們要向新生的大道邁進〉，《自由陣綫》，第2卷第1期(1950年4月)，頁19-20; 另可參見〈我們的基本信念〉，《自由陣綫》，第3卷第3期(1950年10月)，頁4-5。

²³ 參見午潮：〈讀「試評自由陣綫」後的我見〉，《自由陣綫》，第6卷第8期(1951年8月)，頁21。

²⁴ Edward Dillery, "Harvey Feldman" (1999), ADST, www.adst.org/OH%20TOCs/Feldman,%20Harvey.toc.pdf, 12.

²⁵ 張國興：〈序言〉，載張國興編：《香港的前途：民族的自決與獨立》(香港：亞洲出版社，1964)，頁2。

²⁶ Kwong Chi Man and Tsoi Yiu Lun, *Eastern Fortress: A Mili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0-197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236-38.

²⁸²⁹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1-12; 131-39.

³⁰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163-68。關於早期殖民政府向中國宣稱保持中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1930年代日本侵華早期階段，參見Michael Ng, "Rule of Law,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Anxiety of Empire: Press Censorship in British Hong Kong", unpublished paper, 2016.

³¹ 鄭樹森：〈殖民主義、冷戰年代與邊緣空間：談四十年來香港文學的生存狀態〉，《素葉文學》，第52期(1994年4月)，頁20-23。

- ⑳ Jack O'Brien, "Richard M. McCarthy" (1988), ADST, www.adst.org/OH%20TOCs/McCarthy,%20Richard%20M.toc.pdf, 5.
- ㉑ 有關「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經過和後果的詳細記錄，參見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下卷（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2），頁82-92、102-106。關於中國情報系統的研究，參見James Lilley, *China Hands*, 135-51; 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79-98。
- ㉒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5-33.
- ㉓ Lewis Schmidt, "Earl Wilson" (1988), ADST, www.adst.org/wp-content/uploads/2012/09/Wilson-Earl-J.toc_.pdf, 69.
- ㉔ Charles S. Kennedy, "Charles T. Cross" (1997), ADST, www.adst.org/OH%20TOCs/Cross,%20Charles%20T.toc.pdf, 24.
- ㉕ 參見 "Prospects for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t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the Mainland" (27 July 1961), Memorandum for the Directo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fice of National Estimates,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538987.pdf; Charles S. Kennedy, "Jerome K. Holloway" (1989), ADST, www.adst.org/OH%20TOCs/Holloway,%20Jerome%20K.toc.pdf, 12。
- ㉖ 引自 Kwong Chi Man and Tsoi Yiu Lun, *Eastern Fortress*, 245。
- ㉗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447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 XIX, ed. Harriet D. Schwa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2.
- ㉘ 有關1950至1970年代台灣文化與文學界翻譯叢書的重要影響的詳細討論，可參見單德興：《翻譯與脈絡》（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117-58。
- ㉙ 參見 Charles S. Kennedy, "Charles T. Cross", 14; Jack O'Brien, "Richard M. McCarthy", 5。
- ㉚ "Subject: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13 December 1951), Declassified and Released by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ources Methods Exemptions 302B Nazi War Crimes Disclosure Act Date 2007,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TPILLAR%20%20%20VOL.%201_0085.pdf .
- ㉛ "The Asia Foundation Hong Kong" (1952-1923), Asia Foundation Collection (以下簡稱 AFC) Box P-5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 ㉜ Robert Blum, "The Work of the Asia Foundation", *Pacific Affairs* 29, no. 1 (1956): 46-47.
- ㉝㉞ Y.U.D.C. (Youth Union for Democratic China), "A Memorandum" (October 1951), AFC Box P-55.
- ㉟㊱ Maria Yen, "Letter to Ivy" (4 May 1952), AFC Box P-55.
- ㊲ William Hsu, "Letter to Ivy" (13 December 1951), AFC Box P-55.
- ㊳ 參見 Zhang Yang, "Cultural Cold War", 148-69; 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52。
- ㊴ 參見 J. Ivy, "Hong Kong Communication No. 15, Subject: Chinese Student Group" (25 October 1951), AFC Box P-55; Hsu Tung Pien, "Letter to J. Ivy" (13 November 1951), AFC Box P-55; J. Ivy, "Letter to J. Stewart" (27 May 1952), AFC Box P-55。
- ㊵ 盧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頁63-66。
- ㊶ 參見 J. Ivy, "Letter to J. Stewart", HK-2 (2 June 1952), AFC Box P-55。
- ㊷ J. Stewart, "Letter to J. Ivy" (3 June 1952), AFC Box P-55.